

July 2024

## Between High and Low Culture: Su Shi's Culinary Odes and Their Classic Formation

Zuqi Wang  
wangzuqinju@163.com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 Recommended Citation

Wang, Zuqi. 2024. "Between High and Low Culture: Su Shi's Culinary Odes and Their Classic Formation."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44, (2).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44/iss2/17>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 雅俗之间:苏轼饮食赋的经典构建

王祖琪

---

**摘要:**苏轼的饮食赋写作祖述《诗》《骚》,导源于俳辞,将《楚辞》的高洁旨趣与俳辞的幽默诙谐寓于一身,体现了有意变革的文学主张,使赋体完成了由娱神,到娱人,再到娱己的功用。苏轼以全部生命体验投入,在审美取向与情志追求上打破雅与俗的边界,克服内在情志的对立冲突,不再刻意强调赋体书写对象的雅俗性质,而是以平和的心态,以审美的态度书写日常生活。可以说,苏轼对雅俗关系的思考递嬗过程也是逐渐实现自我的人格养成过程。苏轼的饮食赋不是简单的“游戏文字”,而是奠定了一种经典范式,对后世有开创之功。

**关键词:**苏轼; 饮食赋; 雅俗; 辞赋史

**作者简介:**王祖琪,文学博士,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及域外汉学研究。通信地址: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江苏师范大学泉山校区文学院,221008。电子邮箱:wangzuqinju@163.com。

---

**Title:** Between High and Low Culture: Su Shi's Culinary Odes and Their Classic Formation

**Abstract:** Su Shi's culinary odes drew inspiration from *The Book of Songs*, *On Encountering Trouble* and comedian's lyrics, blending the lofty ideals of *The Songs of Chu* and the playful wit of comedian's lyrics. This synthesis reflects Su Shi's intent to innovate within the literary tradition, allowing his compositions to entertain divinities, the audience, and himself. Immersing his full life experience into his work, Su Shi blurred the distinctions between high and low culture in both aesthetic preference and emotional expression. He moved beyond the dichotomy of refined versus common subjects, adopting an aesthetic approach to everyday life with equanimity. Su Shi's reflections on the interplay of elegance and vulgarity also mark his personal journey towards self-realization and character development. Far from mere literary diversion, Su Shi's culinary odes established a classic paradigm with lasting influence on subsequent generations.

**Keywords:** Su Shi; culinary odes; elegance and vulgarity; history of rhymed prose and ode

**Author:** Wang Zuqi, Ph. D.,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in the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Her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and Sinology. Address: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221008, Jiangsu, China. Email: wangzuqinju@163.com.

---

“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何休 徐彦,卷一十六 2287)“歌”作为一种精神活动,伴随着“食”这一“人之大欲”自然而然。以“歌”为源的诗、赋、词、曲等形式皆有饮食书写。纵观整个古代文学发展史,莫砺锋在《饮食题材的诗意提升:从陶渊明到苏轼》一文中指出,苏轼对饮食题材的开拓与诗境的提升居功甚伟(4)。该文的重点在于讨论苏轼的饮食类题材诗作,而苏轼作为一

位兼擅诗、词、文众体的大家,其辞赋创作也值得研究,在他传世的25篇赋作中<sup>①</sup>,有8篇专论饮食,占据《御定历代赋汇》“饮食类”赋作中的六分之一。

在以往的研究中,不少文章关注到了苏轼的饮食类题材创作<sup>②</sup>,而结合赋体书写特点与饮食文化内涵对东坡饮食赋进行研究的文章却并不多见<sup>③</sup>。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可见文化视角介

人文学研究的趋势。就苏轼饮食赋的研究而言,学界的视角往往较为宏观,这就导致饮食赋的特殊性容易淹没于咏物赋之中。故本文拟在此方面作一补充,在对赋体递嬗的动态观照下,关注赋体的文学本质与饮食题材的互动关系,揭橥苏轼饮食赋中体现的雅俗取向与人格养成之间的关系,从而正确定位苏轼的饮食赋价值。

## 一、祖述诗骚与俳辞传统

马积高在《赋史》中对苏轼的饮食类赋作颇有微词,文曰:“然斤斤于酒食药物之间,虽与单纯刻镂物象、详叙物性者不同,然都近于文字游戏了。后来此类赋颇有出现,苏轼是始作俑者。”(429—430)“所以,在当时的文学技巧和士大夫所能涉及的题材范围内,他的赋可谓极尽其变。然而一种新的以文为戏的风气也在赋中出现了。”(430)此种说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苏轼以“酒食药物”为代表的赋作的特点,然苏轼的饮食赋仅仅只是“斤斤于酒食药物之间”“近于文字游戏”吗?或不尽然,若要客观定位苏轼的饮食赋价值,可从其源头考察。

“以文为戏”包括两重意义,一方面是扬雄所谓“雕虫篆刻”,即艰深晦涩,一味铺陈文字而近乎程式化的大赋书写传统;一方面则指不为“载道”,只为“游戏”的作文态度。

先从“雕虫篆刻”谈起。从文体形式上看,《西京杂记》载司马相如论赋之语曰:“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葛洪 93)陈事体物、铺采摘文的汉大赋具有书写奢侈饮食的传统,比如枚乘的《七发》就留下了极盛的饗饗盛宴描写:“于是使伊尹煎熬,易牙调和。熊蹯之臠,勺药之酱,薄耆之炙,鲜鲤之鲙,秋黄之苏,白露之茹。兰英之酒,酌以涤口。山梁之餐,豢豹之胎。小饭大歃,如汤沃雪。”(曾国藩 120)然而,讽喻是大赋的出发点,刘勰在《文心雕龙·杂文》中评价《七发》为:“发乎嗜欲,始邪末正,所以戒膏粱之子也。”(180)一旦洞察了赋家的最终目的,珍馐美味便显疏远与刻意。而骋才炫技式的描写,当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也几成程式,陷入僵化。苏轼在《答谢民师书》中针对这种现象,鲜明表达了对于“雕虫篆刻”的批评:“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扬雄好为艰深

之词,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谓雕虫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类也。而独悔于赋,何哉?终身雕虫而独变其音节,便谓之经,可乎?屈原作《离骚经》,盖风雅之再变者,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可以其似赋而谓之雕虫乎?”(5292)苏轼指出了赋之祖——《骚》为《风》《雅》再变,其本质在于忧世愤戚,是至情至性之体现,而后世往往拘泥于文字形式,盲从经典,刻意而为,以至于失其本意,苏轼刻意通过祖述诗骚来纠雕篆之偏,所以苏轼的饮食赋便有意与汉大赋书写饮食的固定程式拉开距离。

《御定历代赋汇》收录的8首苏轼饮食赋分别是《后杞菊赋》《服胡麻赋》《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酒子赋》《老饕赋》《菜羹赋》《浊醪有妙理赋》,篇篇皆着楚辞色彩。从赋体上看,《服胡麻赋》与《酒子赋》为骚体赋。《服胡麻赋》为苏轼答苏辙《服茯苓赋》所作,主题为服胡麻以养生。罗大经云:“(朱熹)每与其徒言:‘苏氏之学,坏人心术,学校尤宜禁绝。’编《楚词后语》,坡公诸赋皆不取,惟收《胡麻赋》,以其文类《橘颂》。”(苏轼 26)可见连朱熹都推崇《服胡麻赋》寓意之高远。《服胡麻赋》开篇便以“羽人”之神仙梦境导入,承《远游》之余韵而来,《远游》曰“仍羽人于丹丘兮,留不死之旧乡”(洪兴祖 167),神思飘荡,潇洒灵秀。《酒子赋》开篇为三言,间以散句,句式灵活。该篇以未大熟的酒为歌咏对象,寥寥数笔勾勒其做法、得名、色泽、口味,并于篇末以“出妙语为琼瑰”而自矜,颇似“远游天问,瑰诡而惠巧”(刘勰 51)。《服胡麻赋》与《酒子赋》都体现出苏轼有意效法屈原的鲜明创作趋向。

余下6篇虽不为骚赋,然皆出自胸臆,形制精巧,不事铺陈,自然为文,有“其语长短舒纵,抑扬阖辟,辩说诡异,杂错而成章,皆出乎至性。忠厚介洁,得风人之义,然务以忠情达志,非拘拘执笔凝思而为之也”(方孝孺 314)之楚辞真意。《后杞菊赋》所赋杞菊承屈原餐花饮露传统。该篇开头即是一个问句:“吁嗟先生,谁使汝坐堂上称太守?”(苏轼 14)是对赋体早成惯例的问答形式的创格。洪迈评价云:“自屈原辞赋假为渔夫、日者问答之后,后人作者悉相规仿。司马相如《子虚》、《上林赋》,以子虚、乌有先生、亡是公;扬子云《长杨赋》,以翰林主人、子墨客卿;班孟坚《两都赋》,以西都宾、东都主人……皆改名换字,蹈

袭一律,无复超然新意稍出于法度规矩者。……言话非不工也,而此习根著,未之或改。若东坡公作《后杞菊赋》,破题直云‘吁嗟先生,谁使汝坐堂上称太守?’殆如飞龙转鹏,蹇翔扶摇于烟霄九万里之外,不可搏诘。岂区区巢林翮羽者所能窥探其涯涘哉?’(苏轼 17)该评价直指苏轼此赋发端于楚骚源头,打破了汉赋拘泥于问答形式蹈袭一律的模式,表彰其勇于破格的实践精神。

《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老饕赋》《菜羹赋》《浊醪有妙理赋》中或有瑰丽雄奇的神仙想象,或有缥缈脱俗的梦境描写,或有追踪前贤的愿景寄托。从楚辞化用而来的篇句更是俯拾皆是。如《洞庭春色赋》之“嫋嫋兮秋[春]风<sup>④</sup>,泛天宇兮清闲。吹洞庭之白浪,涨北渚之苍湾”(苏轼 52),化用《九歌·湘君》之“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洪兴祖 64—65);《中山松醪赋》之“追东坡而不可及,归舖歃其醪糟。漱松风于齿牙,犹足以赋《远游》而续《离骚》也”(苏轼 58),化用《楚辞·渔夫》之“何不舖其糟而歃其醪”(洪兴祖 180);《老饕赋》之“弹湘妃之玉瑟,鼓帝子之云璈”(苏轼 79),化用《远游》之“使湘灵鼓瑟兮”(洪兴祖 173)与《湘君》之“帝子降兮北渚”(64)等。

赋作为一种文体形式发展到了苏轼的时代,历经骚赋、散赋、骈赋、律赋,还有正在探索中的文赋,已然众体兼备。就用意而言,苏轼主张继承《风》《雅》之变的《骚》体抒发胸臆的传统,而不是大赋流于形式化的歌颂与讽谏。在书写上,苏轼的赋作吸收了大赋的散文气格,但是对于其繁缛铺陈、语意艰涩又持坚定的反对态度。这就注定了他要站在“雕虫篆刻”“游戏文字”的对立面。

从“游戏为文”的作文态度来看。究其源头,可以追溯到赋源俳辞说(许结 潘务正 11),即俳优伶人为保身避害,在嬉笑怒骂中对帝王进行讽谏的传统。《文心雕龙》“谐隐”篇曰:“谐之言皆也。辞浅会俗,皆悦笑也。”(刘勰 194)俳辞一脉源远流长,《汉书·贾邹枚路传》称:“皋不通经术,诙笑类俳倡,为赋颂好曼戏[……]皋赋辞中自言为赋不如相如,又言为赋乃俳,见视如倡,自悔类倡也。”(班固,卷五十一 1038)宋玉长于俳辞,作《高唐》《神女》,敷衍香艳轶事,《登徒子好色赋》颠覆传统的“好色”之论;东方朔《答客难》

自我解嘲,虽发牢骚而不令人生厌;扬雄《逐贫赋》赋予“贫”以人格特点,诙谐幽默。虽然俳辞为主流所轻视,但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中始终存在一种幽默精神。正统如孔子,在听闻自己被形容为“丧家之犬”时,也是“欣然笑曰:‘形状,末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司马迁,卷四十七 1922)这是一种达观的自嘲精神。刘勰曰:“又蚕蟹鄙谚,狸首淫哇,苟可箴戒,载于礼典。故知谐辞謔言,亦无弃矣。”(194)也肯定了谐隐传统箴戒以匡世的合理性一面。

通观苏轼的8篇饮食赋,其中亦充斥着幽默与戏谑。在《后杞菊赋》的序中,苏轼提到自己一开始读到陆龟蒙《杞菊赋》食杞菊之事,颇不以为然,认为是文人做作太过,直到自己“家日益贫”“斋厨索然”“不堪其忧”,只得求“杞菊食之”“扞腹而笑”,故而“作《后杞菊赋》以自嘲”(13)。戏剧化的缘起使得本赋与陆龟蒙之赋有了完全不同的面貌。《老饕赋》以“老饕”自嘲并以入赋,尽显诙谐幽默之本色;《菜羹赋》津津有味描写菜羹的做法,盛赞其美味,津津自道“虽老而体胖”(86);又《洞庭春色赋》序称“戏作赋”(51),手书《中山松醪赋》,只为发友人一笑(59)。诸如此类,不一而足,皆可见苏轼的饮食赋继承了寓庄于谐的俳辞传统。

考察苏轼所处的思想文化背景,苏轼作诗赋本就带有为文学正名的目的,他在《议学校贡举状》中旗帜鲜明地指出:“自唐至今,以诗赋为名臣者,不可胜数。何负于天下,而必欲废之?”(2847)在这种主张下,苏轼有意选择饮食等日常事物作为赋的题材,看似平淡的文学表达却蕴含深意。苏轼的文学创作到了岭南时期,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这类举重若轻、信手拈来的赋作,若不深究,便会淹没其价值。晚年的苏轼在教导侄子作文时指出:“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采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汝只见爷伯而今平淡,一向只学此样,何不取旧日应举时文字看,高下抑扬,如龙蛇捉不住,当且学此。只书字亦然,善思吾言!”(8664)因此,若只看见文字的表面现象,简单以“文字游戏”评价苏轼的饮食赋,不仅有失公允,而且还会忽略其文化渊源。苏轼饮食赋看似游戏的背后,实际上蕴含了“载道”的动机,他有意扩充咏物赋之题材,其创作理念与风格直接导源于

《楚辞》与俳辞,将《楚辞》的高洁旨趣与俳辞的幽默诙谐寓于一身。饮食赋的文学实践体现了东坡在当时为文学正名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宋代文人重视学养、理趣与道德,因而宋赋的特点是内指性的,在反复涵咏中以有限之篇幅最大限度呈现出多层次丰富的情、趣、理。考察苏轼的饮食赋应该着眼于其“大”,正是苏轼这种祖述诗骚、摒弃雕篆、勇于变创的气魄,完成了赋由娱神,到娱人,再到娱己的功用。

## 二、雅俗取向下的自我实现

楚骚与俳辞渊源决定了苏轼的饮食赋是雅俗互渗的,对雅俗关系的处理则体现了苏轼的哲学思考与审美取向。作为一名融通儒释道的北宋士人,苏轼的作品不仅仅具有文学上的价值,亦体现了“究天人之际”的哲学思想。苏轼的哲学在于全,王水照、朱刚在《苏轼评传》中提到宋明道学的内容本身就由整合儒释道三教而来,但是只有一部分宋学家愿意承认这一点,苏轼不仅承认,而且明确倡导(215)。同时,苏轼的思想又是实践的,强调体验的本身,这样就把道学带向了审美的方向(222—223)。所以,把握苏轼的审美取向,就是把握其人的体验过程,而体验本身则正在其人格逐渐形成的动态轨迹中。

宋代的文化是趋雅的。苏轼《于潜僧绿筠轩》云:“可使食无肉,不可使居无竹。无肉令人

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俗士不可医。”(《诗集二》893)与唐代相比,宋代庶族进身的途径更加广阔,步入仕途的寒门士人为了快速适应贵族身份,对雅文化表现出无限的向往。北宋初期西昆体的出现,便为矫正“元和体”之“浅俗”而生。此际,甚至杜甫也被斥以俗,刘攽在《中山诗话》中提到了杨亿与欧阳修对待杜诗的态度:“杨大年不喜杜工部诗,谓为村夫子。[……]欧公亦不甚喜杜诗,谓韩吏部绝伦。[……]欧贵韩而不悦子美,所不可晓;然于李白而甚赏爱,将由李白超超飞扬为感动也。”(288)但是,西昆体最后却因为雕刻破碎,陷入新的流俗窘境。甚至宋诗整体都被后人讥为鄙俗,明人谢榛在其《四溟诗话》中引用《霏雪录》:“唐诗如贵介公子,举止风流;宋诗如三家村乍富人,盛服揖宾,辞容鄙俗。”(12)这是承大唐风流余韵的宋代文人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从魏晋开始出现审美自觉意识起,纯粹的“雅”文化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可供宋人发挥的空间越来越窄;与此同时,宋代商业的极大繁荣,市民阶层的崛起,使得世俗的享乐本身具有了审美的特点。从文学史的角度考察,以苏轼为代表的北宋士人消解雅与俗的对立关系,便带有扩充雅文学内涵的用意。

从整体而言,苏轼的雅俗观可以概括为“雅俗互摄”,但细究其内在理路,存在着不断发展的动态变化。为厘清其发展脉络,可对其饮食赋创作进行编年史的考察。如下表:

赋名	时 间	地点	人 生 际 遇
后杞菊赋	熙宁八年(1075年)	密州	任密州知州,作《次韵刘贡父李公择见寄二首》嘲讽新法。
服胡麻赋	元丰三年(1080年)至元丰七年(1084年)	黄州	“乌台诗案”后被贬,撰《易传》《论语解》。
洞庭春色赋	元祐七年(1092年)	开封	屡经变动,岁末除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充礼部侍郎。
中山松醪赋	元祐八年(1093年)	定州	自请外任,宋哲宗亲政,苏轼请面辞,不允。
浊醪有妙理赋	绍圣四年(1097年)至元符三年(1100年)	儋州	贬居海南,被逐出官舍,于城南买地,与当地黎民交游。
酒子赋	元符元年(1098年)	儋州	同上
菜羹赋	元符元年(1098年)	儋州	同上
老饕赋	元符二年(1099年)	儋州	同上

《后杞菊赋》是苏轼唯一一篇创作于“乌台诗案”以前的饮食赋。从屈原的“秋菊落英”到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菊”作为一种高雅的审美意象被固定下来。屈原是不是真的餐花饮露，后人不得而知，然其审美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苏轼笔下的“杞菊”却真的是入口之食粮，文曰：“吾方以杞为粮，以菊为糗。春食苗，夏食叶，秋食花实而冬食根，庶几乎西河、南阳之寿。”（14）在这里，“杞菊”不再作为一种象征性的高雅意象，而是可以果腹的养生菜蔬，体现了作者刻意的变雅为俗。苏轼的这一创格也促成辞赋从具有象征意味的美食书写到对饮食本身的关注转向。《后杞菊赋》有一组问句：“人生一世，如屈伸肘。何者为贫？何者为富？何者为美？何者为陋？”（14）其中包含了等同雅俗的倾向。然而此际的苏轼尚处于政治斗争的漩涡中，本赋更多地体现的是揶揄、自嘲与反讽，直斥王安石新法，带有战斗力度。可参见同年苏轼所作诗《次韵刘贡父李公择见寄二首》，其二曰：“何人劝我此间来？弦管生衣甑有埃。绿蚁沾唇无百斛，蝗虫扑面已三回。”《乌台诗案》云：“此诗讥讽朝廷新法减削公使钱太甚[……]”（苏轼 1306）可见，这组问句更像是苏轼作为庄子信徒的心灵呼告，而在其人生体验与创作实践中，并没有达到所书写的境界。

《服胡麻赋》作于乌台诗案的第二年，经过生死之变，苏轼的心绪趋于沉潜。此篇实际上是对“胡麻”的“去魅”，苏轼指出世人苦苦追寻的“长生不死”神药“胡麻”，其实就是随处可见的普通“脂麻”（芝麻）。赋的开篇是羽人托梦的神仙异境，而神人道破的天机是将传说中的神药打回原形。这对于神话传说中的“胡麻”而言是化雅为俗，对于现实可见的“脂麻”而言，又是化俗为雅。苏轼强调对现实生活的关注，主张保养身体，而不是追求虚无缥缈的长生不老。此际，政治打击并未消弭苏轼的用世之心，他在黄州期间与故交频繁通信，密切关注时局，所以服用胡麻，注重养生，养精蓄锐，韬光养晦，以期重返政治舞台。

《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是作为“元祐大臣”的苏轼经过人事浮沉后的感悟，较之前赋，其追随屈子的楚骚情怀尤为明显，流露出人生如泡影的消极情绪。在此之前的酒题材赋作，或歌颂酒德，或劝戒少饮，或寓意立身处世，直到唐代陆龟蒙的《中酒赋》，开始流露出悲士不遇的情绪。

苏轼的《中山松醪赋》对这一主题进一步发挥，以埋没深山的松节为悲叹对象，寄托胸中不遇之幽愤，赋曰：“燧松明而识浅，散星宿于亭皋。郁风中之香雾，若诉予以不遭。岂千岁之妙质，而死斤斧于鸿毛。效区区之寸明，曾何异于束蒿。”（57）并于结尾处直接抒发了“犹足以赋《远游》而续《离骚》”（58）的志向。当中国的士人在“入世”中挣扎时，屈原往往作为精神偶像出现，因为从审美取向来说，屈原时时流露出自己高洁脱俗，却为俗所害的情思。苏轼对屈原的追求反映了从雅文化本身转向对文人精神的追求与探问，体现了宋人追求雅而更雅的趋向。

前四篇赋作中的苏轼正在经历一个痛苦的蜕变过程：是归向老庄的虚无，还是沉溺佛家的禅机？是追随屈原的远游，还是隐居陶潜的田圃？这些问题尚且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关于雅俗关系的处理，也更多地出于开拓“雅”文学境界的目的，略显刻意。而作于被彻底放逐后的《浊醪有妙理赋》《酒子赋》《菜羹赋》《老饕赋》四首饮食赋则体现了苏轼思想的圆融与解脱。此际，苏轼已经完全破除了雅与俗之间的界限，平凡事物，一经点染，便得雅趣，这种“尽俗成雅”的观念不再是一种感悟，而是一种体验，是“以全部世俗生活的丰富性来体现‘雅’的内涵”（王水照 朱刚 541）。

“浊醪”与“酒子”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佳酿，在前代的饮酒赋中极少作为书写对象。苏轼以浊醪为赋出自杜甫诗《晦日寻崔戡李封》：“浊醪有妙理，庶用慰沉浮。”（298）以前的酒赋中，作者往往强调清与浊的区别，邹阳《酒赋》云：“清者为酒，浊者为醴。清者圣明，浊者顽騃。”（陈元龙，卷一百 1a）王粲《酒赋》云：“醜沉盎泛，清浊各异。”（2b）而苏轼的《浊醪有妙理赋》并没有刻意强调清浊之区别，关于本赋的“浊者以饮吾仆，清者以酌吾友”（苏轼 98）句后世颇多争议，黄徹云：“子瞻赋《浊醪有妙理赋》，首句云：酒勿嫌浊，人当取醇。其末乃云：浊者以饮吾仆，清者以酌吾友。复立分别，则是浊醪无妙理矣。岂非万斛汹涌，不暇点校故欤？”（苏轼 105）姚宽云：“东坡《浊醪有妙理赋》云：浊者以饮吾仆，清者以酌吾友。仆，谓我也，或以为奴仆，误矣。”（苏轼 105—106）其实，通过联系整篇语境，这两句话或可作互文看，清酒也罢，浊酒也罢，本无高下

之分,浊醪有妙理不代表浊醪高于清酒,重要的是饮酒的心绪和饮酒人赋予酒的妙理,所以浊醪、酒子作为对象自然也就不存在雅与俗的分别。

《菜羹赋》以乡野之菜蔬煮制的羹为书写对象,述其渊源,可追溯到晋张翰的《豆羹赋》。所不同的是,张翰之赋在于忆苦思甜,曰“追念昔日,啜菽永安”。(陈元龙,卷一百 22b)其食用体验,也实在不够愉悦:“时御一栢,下咽三叹。”(22b)而苏轼则是完全以审美的态度来书写菜羹。菜羹不同于杞菊,其食用价值远远高于文化意义,苏轼在书写中,也并不想对其精神进行赋予与拔高,而是以平和闲适的态度,叙述日用常见之物。此时,卜居南山的苏轼已经完全从楚骚困境中超脱出来,而归向陶渊明的“心平气和”。

关于《老饕赋》的创作时间颇有争议。《苏诗总案》认为此赋作于元符二年(1099年),学界多从此说。而《苏轼全集校注》则认为作于熙宁五年(1072年)。理由是苏辙《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中提出:“东坡先生谪居儋耳……葺茅竹而居之,日啖薯芋,而华屋玉食之念不存于胸中。”(苏轼 79)而本赋内容:“岂止‘华屋玉食’而已!”再从“辞句华丽,情调浪漫”推出不可能作于已入老境之时期,故而得出熙宁五年作于杭州的结论。(79—80)这种考证未免过“实”,本赋之精髓,在于最后几句:“美人告去已而云散,先生方兀然而禅逃。响松风于蟹眼,浮雪花于兔毫。先生一笑而起,渺海阔而天高。”(79)颇得汉赋“曲终奏雅”之精妙。饮食的华美只是梦幻泡影,美人云散,先生方悟,而最后“一笑而起”,则将本赋的风调从虚无中拯救出来,而归于旷达。而这种心境恰恰符合贬居海南以“老饕”自嘲的苏轼。

以时间为线索,苏轼在《杞菊》《胡麻》《洞庭》《中山》四赋中一直在思考雅与俗的辩证关系,无论是以雅为俗,以俗为雅,还是雅而更雅,却因为缺少体验,而难以自洽。直到《浊醪》《酒子》《菜羹》《老饕》问世,苏轼在实践中完成了雅与俗的融通互见,他不再刻意强调赋作书写对象的雅俗性质,而是以平和的心态,以审美的态度书写日常生活。一旦苏轼参透雅与俗之间的关系,就将自己从困境沉溺中解放出来,克服了内在情志的对立冲突,完成了自我实现。

### 三、经典范式的确立

苏轼具有集大成的意识,他的思想底蕴在于“全”,体现在文学创作上,是一种包容而又超越的态度。因而,包括诗词赋在内的文学体式在苏轼的笔下都有一定的实现与变创,苏轼的八篇饮食赋就标志着一种经典范式的新创。

首先,从作者的性分、才力、文学主张等内部要素来看,苏轼对美食的由衷喜爱,并不是因为这种食物有什么特殊意义,也不是用食物来标榜自身的品行。苏轼敢于尝试,也敢于书写,所以,过去为文人所不屑食用的食物,比如江南可能致命的河豚、黄州价贱如泥的猪肉、岭南野生粗陋的生蚝,都能成为苏轼口中的美味佳肴与津津乐道的对象。苏轼愿意悦纳生活的全部内容,并将之升华成人生的哲理与趣味,而不是借由食物所带来的虚名来标榜自我。

苏轼有《酒隐赋》一篇,该赋不能算作饮食赋,然与酒相关,刻画了一位酒中隐士。这位“以酒自晦”的逸人本隐于“凤山之阳”,然而为“酒隐”之名所扰,不得不出山入仕。苏轼对其“不择山林,而能避世”(93)表现了高度的赞誉。隐居本身只是一种自我的选择,所以入仕也心怀坦荡,因为这一切的出发点都不是为了虚名,而是为了心灵的安适。隐于酒中,是为了“酣羲皇之真味,反太初之至乐”(93),而不是“暂托物以排意”(93)。反观现实中的一些人,“若乃池边倒载,瓮下高眠。背后持锺,杖头挂钱;遇故人而腐胁,逢曲车而流涎”(93),一味模仿酒中前贤,只是坠入虚名与迷茫的深渊中,一旦“使其推虚破梦,则扰扰万绪起矣,乌足以名世而称贤者耶?”(94)

“酒隐”又何尝不是东坡自况?在苏轼的哲学体系中,他重视的是“体验”本身,而不是“体验”的结果。苏轼热衷于写作饮食类题材的诗赋,是因为这类题材能体现“体验”,而此中之“真意”又与苏轼的文学主张相契合。他在《自评文》中写道:“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汨汨,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7422)“随物赋形”是苏轼的写作原则,所以他笔下的饮食淡化了此前人为强加的意义,而由其自身属性生发出新的意趣,从而呈现出“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的面貌。

苏轼对于自己的饮食赋创作非常喜爱,他的一生都在进行此类题材的创作,同时,还积极宣传自己的饮食赋。苏轼曾多次书写《中山松醪赋》与《洞庭春色赋》,并将之赠予友人。《与钱济明十六首》之二:“寄惠洞庭珍苞,穷塞所不识,分饷将吏,并戴佳觥也。无以为报,亲书《松醪》一赋为信,想发一笑也。”(5809)又《与陈季常二十首》之十六首:“在定日作《松醪赋》一首,今写寄择等,庶以发后生妙思,著鞭一躍,当撞破烟楼也。”(5890)又《与程正辅七十一首》之四:“向在中山,创作松醪,有一赋,闲录呈,以发一笑也。”(5954)又《书松醪赋后》:“始予尝作《洞庭春色赋》,传正读爱重之,求予亲书其本。近又作《中山松醪赋》,不减前作。[……]录本以授思仲,使面授传正,且祝深藏之。”(7430)现存最长的苏轼书写手迹便是此二赋合卷,现在收藏于吉林博物院。从多次赠送不同友人的行为来看,苏轼本人不仅对这两篇饮食赋的书写较为满意,而且还体现了强烈与他人分享自我抒怀欲望。苏轼以老饕自诩,以饮食赋为自己代言,是其饮食赋的经典地位得以确立的内在机制。

其次,从东坡饮食赋的影响来看,后世对东坡饮食赋的继承最直接的是次韵与同题创作。王芑孙《读赋卮言·和赋例》曰:“次韵之赋,亦起于宋,而盛于明。宋吕[李]纲<sup>⑤</sup>《浊醪有妙理赋》,次东坡韵。”(1021)苏李二赋,皆以“醇、神、真、命、正、性、并;风、红、空、功、纵、用、重;褊、舖、娱、无、腴、间;妾、捷、狭、接;如、徒、疏;酒、友、口”为韵。(曾枣庄 130)在此之前,只有次韵之诗,未见次韵之赋,李纲此赋开创了次韵之赋之先河。从思想内容上看,李赋对苏赋多因袭,未见新意。

张耒与张栻都有《后杞菊赋》同题赋作。张耒效法其师东坡,承陆龟蒙《杞菊赋》家贫食杞菊的传统而来,序中提到盛侨以苏轼《后杞菊赋》示他,于是豁然开朗,不再为穷苦所叹。全赋以主客问答形式进行,通篇体现出在东坡人格精神的统摄下,作者的自身体悟与反思。张栻赋作则与陆、苏、张不同,他是四人中唯一一个“当无事之世,据方伯之位”(陈元龙,卷一百 21a)的“太平富贵人”,所以有客不解他为何要效仿坡公,张栻便抒发了关于“天壤正味”的议论,他认为“厚或腊毒,淡乃其至。猩唇豹胎,徒取诡异。山鲜海错,纷纠莫计”,而“惟杞与菊,中和所萃”(21ab)。如果说

前三者的《杞菊赋》是从体验而起,张栻则是从议论而起,他将东坡剥落的“杞菊”意味重新拾起,并赋予了更多的哲理思辨意义。后世谈到宋代的诗与赋,往往责之过“理”。清代浦铣说:“宋元赋好著议论。”(379)张栻此赋便确实存在这一问题,其理学色彩遮蔽了饮食本身,“杞菊”只是一个载体,而不是书写的直接对象。后世的议论往往将其归罪于苏轼,认为他始开先河,其实东坡强调的,是以内心流露的真意,描摹世间万物之自然,以所咏之物为本体,融理趣于一身。后来者往往只继承了其次要的一点,而忽略了“自然”之真意。恰如方孝孺评汉赋:“至于其徒,寔失师意,流于淫靡,而相如与雄复慕而效之,穷幽极远,搜辑艰深之字,积累以成句,其意不过数十言,而衍为浮漫瑰怪之辞,多至于数千言,以示其博。”(314)便说明了敷衍次要而丧失本体的问题。张耒赋虽无创新,胜在不造作。张栻此赋则敷衍太过,只见性理,不见自我。

直接受苏轼饮食赋影响的还有祝允明的《饭苓赋》、洪翼圣的《菜羹赋》、戴表元的《胡麻赋》、徐渭的《胡麻赋》、王恽的《茹野菊赋》等。除此之外,赋予生活日用以审美趣味的作赋方法,也极大地影响了后世的辞赋创作。出现了任士林的《老婆牙赋》、陈崑的《豆芽菜赋》、刘敏中的《腊粥赋》、蒲松龄的《煎饼赋》《绰然堂会食赋》等。

最后,从赋的内在发展来看,东坡饮食赋的意义不仅仅在于“饮食”这种题材本身,还代表了有宋一代文人对于赋的探索。经过铺张扬厉、体国经野的汉大赋,金声玉润、绣错绮交的两晋六朝骈赋,新巧韵险、对偶工稳的唐律赋,宋赋兼综众体并加以发挥。宋人最显著的尝试是变“大”为“小”,即将目光聚焦于微末,然寓意深远,却容易陷入流俗,淡化了赋的审美意义,趣而不美,如欧阳修的《憎苍蝇赋》、孔武仲的《憎蝇赋》、张孝祥的《攻蚊辞》、蔡戡的《蚤赋》、洪咨夔的《烘蚤赋》、薛季宣的《蛆赋》等。而苏轼却善于发现日常生活中平凡事物之美,以饮食之“真味”入赋,打破了审丑刺世的桎梏。苏轼强调君子应“寓意于物”,他提到:“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苏轼 1122)放眼苏轼的饮食赋,其中便体现了这一主张。苏轼以赋体书写饮食,从精



神上悦纳自己所咏之物,且并不被食物的世俗象征寓意所束缚,体现了对物的超越,正是“寓意于物”。如果过于强调所咏之物或美或丑的特点,刻意发掘其中的“高深理趣”,便容易深陷其中,只能“留意于物”了。可以说,苏轼饮食赋承“诗骚”“俳谐”二源而来,纳日用万物于胸中,集谐趣、理趣、情趣于一身,淡化了雅与俗的审美边界,是对赋这种雅文学体式的一种扩充与变革。

## 结 论

苏轼的饮食赋之所以能以区区8篇之数奠定在赋史乃至学术史上地位,在于儒释道思想的影响下独特的审美取向,进而推动了自觉的文学变革主张。苏轼的文学变革主张具有整体性,除了赋以外,其诗、词、颂等文体形式都有饮食题材的描写,在完成了饮食在诗赋中的诗意提升的同时,“义必纯美”(刘勰 107)之颂在他的笔下也化雅为俗,出现了诸如《东坡羹颂》《油水颂》《猪肉颂》之类的作品。苏轼的各种体裁创作是共同进行,不可割裂的。

饮食赋琐细的题材在赋体的诠释下很容易流于“雕虫篆刻”或“庸俗鄙陋”,事实上,赋学史上很难发现苏轼饮食赋的优秀继承者,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但是后学难以为继并不能归咎于苏轼,这恰恰体现了苏轼饮食赋的独特性。如同后世对杜甫韩愈“以文为诗”的争论,苏轼作为一位赋体的尝试者,平衡了雅俗之间的矛盾,在后世的模仿与争论中,奠定了一种经典范式。

## 注释[Notes]

- ① 据《苏轼全集校注》收录,苏轼赋共27篇。其中《飓风赋》《思子台赋》为其子苏过所作,故共有25篇。
- ② 除上文提到的莫砺锋的文章外,还有史笑添:《从奇想恣肆到儒家文学批评——苏轼饮食书写的渊源、表现与意义》,《古代文学理论研究》1(2023):264—285;李健:《美食与人生:苏轼的生活美学管窥》,《中国文艺评论》1(2022):78—90;王友胜:《苏轼饮食文学创作漫论》,《古典文学知识》3(2012):49—56;等等。且出现了一批学位论文,如浙江大学刘丽的博士学位论文《宋代饮食诗研究》(2017年);陕西理工大学王紫骆的硕士学位论文《苏轼饮食文化书写研究》(2022年);辽宁师范大学鞠强的硕士学位论文《苏轼饮食题材诗词研究》(2019年);等等。

③ 目前可见比较完备的论文是许东海:《苏轼饮食赋之困境观照及其文类书写策略》,《中正大学学术年刊》6(2004):101—124。此外林黛琿:《论苏轼“以酒为题”赋作之情志底蕴与困境观照》,《金门大学学报》1(2010):1—17,未出此文藩篱。万焱、欧阳俊杰:《东坡赋与中国酒文化》,《中华文化论坛》4(2013):106—114,则专注于从酒文化的角度对东坡赋展开研究。山东大学刘俞廷的博士学位论文《历代辞赋中的饮食书写研究》(2021年)部分涉及苏轼赋作的饮食书写。

④ 《苏轼全集校注》此句为“嫋嫋兮秋风”,应为“嫋嫋兮春风”。

⑤ 应为李纲。

##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 班固:《汉书》卷五十一。长沙:岳麓书社,1993年。
- [Ban, Gu. *Book of Han*. Vol. 51. Changsha: Yuelu Press, 1993.]
- 陈元龙:《御定历代赋汇》卷一百。康熙四十五年内府刊本,1706年。
- [Chen, Yuanlong. *Imperial Selection of Odes across Dynasties*. Vol. 100. Block-printed edition in 1706.]
- 杜甫:《杜诗详注》,仇兆鳌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 [Du, Fu. *A Comprehensive Interpretation of Du Fu's Poems*. Ed. Qiu Zhao'ao.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79.]
- 方孝孺:《逊志斋集》,徐光大校点。宁波:宁波出版社,1996年。
- [Fang, Xiaoru. *Collected Works of Fang Xiaoru*. Ed. Xu Guangda. Ningbo: Ningbo Press, 1996.]
- 葛洪:《西京杂记》,周天游校注。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
- [Ge, Hong. *Xijing Miscellanea*. Ed. Zhou Tianyou. Xi'an: Xi'an Sanqin Publishing House, 2006.]
- 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一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 [He, Xiu, and Xu Yan, eds. *Annotated The Gongyang Commentary to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Vol. 16.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0.]
- 洪兴祖:《楚辞补注》,白化文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
- [Hong, Xingzu. *Supplementary Notes to The Songs of Chu*. Eds. Bai Huawen, et al.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2.]
- 刘攽:《中山诗话》,《历代诗话》,何文焕辑。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283—299。
- [Liu, Ban. "Poetry Remarks of Liu Ban." *Poetry Commentaries across Dynasties*. Ed. He Wenhuan.

-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0. 283 – 299. ]
- 刘勰:《增订文心雕龙注》,黄叔琳注,李详补注,杨明照校注拾遗。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 [Liu, Xie. *Annotated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 Eds. Huang Shulin, Li Xiang and Yang Mingzhao.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0. ]
- 马积高:《赋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 [Ma, Jigao. *A History of the Ode*. Shanghai: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1987. ]
- 莫砺锋:《饮食题材的诗意提升:从陶渊明到苏轼》,《文学遗产》2(2010):4—15。
- [Mo, Lifeng. “Poetic Enhancement of Dietary Themes: From Tao Yuanming to Su Shi.” *Literary Heritage* 2(2010): 4 – 15. ]
- 浦铤:《历代赋话校证》,何新文、路成文校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 [Pu, Xian. *Annotated Ode Commentaries across Dynasties*. Eds. He Xinwen and Lu Chengwen. Shanghai: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07. ]
- 司马迁:《史记》卷四十七。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
- [Sima, Qian.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Vol. 47.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3. ]
- 苏轼:《苏轼全集校注》,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
- [Su, Shi. *Annotated Complete Works of Su Shi*. Eds. Zhang Zhilie, Ma Defu and Zhou Yukai. Shijiazhuang: Hebe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0. ]
- 王芑孙:《渊雅堂全集》,王义胜整理。扬州:广陵书社,2017年。
- [Wang, Qisun. *The Complete Works of Wang Qisun*. Ed. Wang Yisheng. Yangzhou: Guangling Publishing House, 2017. ]
- 王水照 朱刚:《苏轼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 [Wang, Shuizhao, and Zhu Gang. *A Critical Biography of Su Shi*.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
- 谢榛:《四溟诗话》,宛平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 [Xie, Zhen. *Poetry Remarks of Xie Zhen*. Ed. Wan Ping.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05. ]
- 许结 潘务正:《赋学讲演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 [Xu, Jie, and Pan Wuzheng. *Lectures on Ode Studies*.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9. ]
- 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长沙:岳麓书社,2009年。
- [Zeng, Guofan. *Selected Works on Chinese Classics*. Changsha: Yuelu Press, 2009. ]
- 曾枣庄:《辞赋的唱和体》,《古典文学知识》6(2012):128—131。
- [Zeng, Zaozhuang. “The Responsory Style of Poetry and Ode.” *Knowledge of Classical Literature* 6(2012): 128 – 131. ]

(责任编辑:程华平)